



社会空间的维度： 中国、韩国和美国的比较研究

王进 / 著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http://www.hustp.com>



社会空间的维度： 中国、韩国和美国的比较研究

王进 / 著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http://www.hustp.com>

中国·武汉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社会空间的维度:中国、韩国和美国的比较研究/王进著. —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2013.10
ISBN 978-7-5609-9464-2

I. ①社… II. ①王… III. ①文化社会学-比较文化-中国、韩国、美国 IV. ①G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45445 号



社会空间的维度:中国、韩国和美国的比较研究

王进 著

策划编辑:曾光

责任编辑:狄宝珠

封面设计:龙文装帧

责任校对:何欢

责任监印:朱玢

出版发行: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中国·武汉)

武昌喻家山 邮编:430074 电话:(027)81321915

录排:华中科技大学惠友文印中心

印刷:虎彩印艺股份有限公司

开本:710mm×1000mm 1/16

印张:12

字数:233千字

版次:2014年12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定价:32.00元



本书若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出版社营销中心调换
全国免费服务热线:400-6679-118 竭诚为您服务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谨以此书献给我的导师金在温(Jae-On Kim)教授

摘要

Charles Osgood 是将语义差异的研究方法应用于调查不同文化中的情感意义的学术先驱之一。通过对世界范围内的 21 种语言/文化进行跨文化的比较研究, Osgood 等发现评价(evaluation)、效能(potency)和动力(activity)(EPA)是构成人们对所处环境内的事件所具有的情绪感受中最为显著的三个维度。Osgood 进一步发现这三个维度在其研究的全部 21 种文化中似乎普遍地存在。他的这项研究随后为 David Heise 对社会心理学的情感控制理论(affect control theory, ACT)进行数学建模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并且这三个普适性的维度在以该理论为背景的相关研究中得到了充分的应用。

通过收集最新的中国研究数据,本研究致力于进一步窥探情感意义下的潜在维度,特别是那些与社会身份相关的情感意义。与此同时,从其他途径收集的韩国和美国数据也将在本研究中进一步分析,用来与中国研究数据对比。对于调查数据的分析证实,人们对于“社会性”事物的情感可能与他们对“物质性”事物的情感大相径庭。而在文化与文化之间,构成对社会身份的情感意义的基本维度也各具特色。

如果我们设想在一个社会空间中,个体通过自身对他人的情感来将他人排序定位,那么这些情感的维度就可以成为定义该社会空间的坐标。利用三份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数据,本研究将探究到底何种“社会图景”存于此社会空间,以及该“社会图景”是如何因文化而异。研究的结果表明,我们需要谨慎地使用那些由“社会”维度所定义的社会空间,因为这些空间中所嵌入的主观意义在不同的文化中也许截然不同。

前言

本书的主干部分是我若干年前在美国依阿华大学(University of Iowa)^①的博士论文,回国之后一直忙于其他的研究题目,所以一直没能把它翻译成中文出版。因此在这里要首先感谢现在乔治亚大学学习的赵珺慷慨地利用去年夏天的时间,帮我把它翻成了中文。

情感控制理论(Affect Control Theory, ACT)是美国印第安纳大学社会学家David Heise在20世纪70年代创立的一个社会心理学理论。从事情感控制理论研究的学者自称为ACT-er,是一个基于师承关系而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小群体,学术生产力很高,在美国社会心理学领域颇有影响。赵珺现在的导师Dawn Robinson教授是我在依阿华大学时候的老师和我博士论文委员会成员,是情感控制理论的“第三代传人”和这个理论流派中最活跃、最有影响的成员之一。

社会心理学是依阿华大学社会学系传统上最强的一个方向。当时我的同学中间有差不多一半是学社会心理学方向的,而其中恐怕又有一半是做情感控制理论研究的,基本上都是受Dawn的影响。2002年5月,在北美的ACT-er齐聚佛罗里达东岸的一个海滨庄园,开了三天的会,庆祝Heise从印第安纳大学退休。Dawn率领的从依阿华去的阵容最强大,大家戏称ACT的中心现在已经挪到了依阿华。

我其实一直是对宏观社会学更感兴趣。我的导师Jae-On Kim教授的主要研究方向是政治社会学,社会分层,以及定量研究方法,我后来在这几个方面的兴趣都是因为受他的影响。我首次认识Jae是1993年6月,当时我在武汉大学哲学系读历史唯物主义方向的研究生。Jae作为依阿华大学亚太研究中心的主任,第一次访问中国,顺着京广线,从广州到武汉,然后从武汉去北京。我被系里安排做他的翻译和接待工作。

^① Iowa有多种中文翻译,以前翻成依阿华,现在大多翻成爱荷华,与英语发音比较接近的是艾奥瓦(其实“哎啞哇”最准确),但我习惯了说依阿华,换成任何其他叫法都比较别扭。同样的原因,所有英文人名也都用英文,因为除了像马克思、克林顿这样家喻户晓的名字,其他人的名字翻成中文之后大多数人都很难对上号,还不如保持英文的原名。

在他的鼓励下我从那年秋季开始着手申请去美国留学。1994年8月我到达依阿华,开始了我在美国近十年的学习生活。在依阿华的头几年,我一直跟着Jae在亚太研究中心做他的研究助手。Jae在亚太研究中心的秘书Peggy Pick-Sutton是我那几年打交道最多的人。她的先生在依阿华的工程学院读博士,所以她对我另外几个也是Jae的研究助手的韩国同学有着一种天然的同情。

按照Peggy的说法,读研究生就像马戏团里的动物钻火圈,你必须一个火圈一个火圈地跳,跳完所有的火圈你才能毕业。每一门课,每一个考试,每一篇论文都是一个火圈,你必须跳过去,无论你认为是有道理还是没道理,无论你喜欢还是不喜欢。美国大学里的研究生也跟中国大学里的一样,读书的时候都会在背后议论和抱怨课程、考试、老师,但是一个重要的区别是在美国大学里抱怨归抱怨,要想拿到学位,每个人都还是只能硬着头皮去跳完每一个火圈,因为请人说情或者自己去找老师求情都是被严重鄙视的行为,比不过还糟糕,当然在美国也不会有人会帮你说情。

刚去依阿华的时候,曾经听一个早去几年的中国学生感慨说美国的研究生教育确实强,因为它可以把一个基本上什么都不懂的人训练成到毕业的时候可以独立从事专业工作的专业人员。逼着你钻火圈大概就是秘诀。

在美国的大学里,导师和研究生的关系基本上是以工作关系为主,私人关系通常没有中国大学里面这种传统的师傅带徒弟的关系这么紧密。但是也许因为同是东方人的原因,Jae和我之间更像东方传统的师徒关系。他对我的影响也远远超出了专业和研究训练方面。

Jae出生和长大在日本占领时期的韩国。20世纪60年代初毕业于韩国首屈一指的国立首尔大学的社会学系。在服短暂兵役期间受到一位美国军官的资助,乘美国海军的运输舰前往美国留学。在南伊利诺伊大学获得社会学硕士学位后进入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攻读博士学位,毕业后先任职于芝加哥大学著名的国家民意研究中心(NORC),与著名的SPSS软件的发明者Norman Nie差不多同时开始在NORC工作。Norman Nie当时刚从斯坦福大学毕业,SPSS软件是他为了做博士论文的数据分析与朋友合作开发出来的。到芝加哥大学之后Norman Nie继续开发SPSS并开始向其他研究机构和研究者提供这个软件,Jae是Norman Nie在芝加哥大学期间的早期合作者,并且参与了编写SPSS的第一本书——《SPSS: Statistical Package for Social Sciences》(Nie, et al. 1970)。因为SPSS是第一个让广大的社会科学研究者可以相对方便地运用计算机进行定量数据分析的软件,它的出现和普及对社会学的定量研究有着划时代的影响。这本书后来被加拿大社会学家Barry Wellman推崇为当代“社会学的最有影响的一本书”。Wellman把SPSS的发明对于社会学研究的意义比作伽利略发明望远镜,因为它“给了我们可以看见东西的眼睛”,“可以自己动手做分析”。

我在武汉大学读本科二年级的时候，曾经组织过一个校团委资助下的武汉大学学生的问卷调查，收集了好几百份问卷。没办法用手工进行分析，只能求助于计算机系的朋友，请他们为我写一个数据录入和分析的程序，所以有很长一段时间跟他们混在一起，跟着学了一点 DOS 系统的基本操作。记得当时计算机系的机房里还全是 8088 的机子，他们的梦想是能用上 286。武汉大学计算中心的公共机房里则全是连硬盘都没有的机子，所有的文件和操作都是在 5 寸软盘上进行的，进机房还要脱鞋。

大三开学不久系里来了一个美国的访问学者，带来了一套学生版的 SPSS。为了方便系里老师学习使用 SPSS，社会学教研室斥巨资两万多元购置了第一台电脑，AST286，512KB 的内存，40MB 的硬盘，还配一台 EPSON 的针式打印机。那时系里会用计算机的人不多，我成了这台计算机唯一的使用者，在当时算是很奢侈的了。我的计算机系的朋友过来玩过几次，颇为羡慕。这位美国老师走的时候送了我几本如何使用 SPSS 进行统计分析的书，我对着这几本书学会了 SPSS 的基本操作。当时的 SPSS 还是 DOS 版的，并且没有交互菜单功能，需要写命令进行操作，所以我的 SPSS 学得比较扎实，也算是跟 Jae 有点命中注定的缘分。

两年之后在武汉大学第一次认识 Jae，他对我竟然会用 SPSS 有点诧异，告诉我他是 SPSS 最初的那本书的撰写者之一，我心中立马觉得无限景仰。1994 年我到达依阿华，在亚太研究中心做 Jae 的研究助理，跟一个来自韩国的访问学者共用一间办公室，但是我自己有一台电脑，Intel 486，Windows 3.1 系统，配的是惠普的激光打印机。SPSS 也已经有了 Windows 版本了，用户界面漂亮和方便了很多。我当时非常感慨中国跟美国在计算机普及上差距太大了。不过现在 20 年过去了，中国和美国在计算机硬件配置上基本没有差别了，最新的产品在美国一出现，中国市场上马上就可以买到了。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过去 20 年的进步是巨大的。

我给 Jae 做研究助理的头两年其实没做太多研究的事，一是因为头两年课程压力比较大，二是因为 Jae 作为亚太研究中心的主任忙于中心的建设，也不太顾得上我，三是现在回想起来，当时的我，初来乍到，啥也不懂，估计也做不了什么事。不过我跟 Jae 倒是从一开始就发现了一个共同的爱好，就是“鼓捣”计算机。

那几年学校为了吸引他出任亚太研究中心主任，每年给他一小笔钱专门用来更新计算机设备，所以 Jae 的计算机和相关设备在当时是整个系里最先进的，也是更新最快的。因为他在中心、在系里、在家里都有电脑，而且还有多台笔记本电脑，所以要想保持所有这些电脑的硬件、软件随时都是最新的，性能最好的，硬件和软件，整机和部件的升级换代几乎成了日常性的工作，这也就成为我们共同的娱乐活动。Jae 升级换代下来的有些部件没处去，自然也就淘汰了给我，所以我的计算机和相关设备恐怕在我的同学中间也算比较先进的。

我起初只是觉得有趣。Jae 的秘书 Peggy 经常嘲笑 Jae 的计算机有一大半时

间是开着盖子运行的，并且经常嘲笑我们隔三差五的就猫在地上鼓捣计算机，我和 Jae 都乐在其中，不觉得有什么特别的。很多年以后，有一次跟 Jae 聊天，他说其实像他那样自己动手鼓捣计算机在同龄人中间是不多的，因为很多人到他这个年纪就不再愿意或者不再有信心去学一个完全新的东西了。但是对他来说，既然要用计算机，那么知道计算机究竟是怎么回事是很重要的，而要想知道计算机究竟是怎么回事，就得敢自己动手拆和装。自己拆装过的东西你自然就不会怕了。

我于是明白了他以前曾经说过的，他在年轻的时候把数学书当作娱乐和消遣的书来看是为什么了，以及他为什么能够成为统计和定量分析方法的专家。因为数学无疑是统计和定量分析方法的基础，不懂数学，甚至害怕数学，当然是没办法做定量研究的。如果想要成为一个好的研究者，尤其是一个好的定量研究方法的学者，没有对数学的把握和信心是不可能的。读通了数学才可能具备把统计和定量研究方法“拆”开并且再“装”回去的能力，而也只有这样你才能说你真正明白统计和定量研究方法是是怎么回事。

当时在依阿华的另外一位定量研究方法的老师，Scott Eliason，也是这样的。他在 Penn State 读书的时候，导师是著名的社会学家和统计专家 Clifford Clogg，他们一起合作发过好多篇在社会学定量研究方法上很有影响的文章。据说他当年几乎上完了统计系和数学系的课。他在依阿华教统计课，讲义上好多数学公式，上课的时候也是讲公式，作业还有公式的推导，虽然其实很简单，但是我的美国同学们私下颇多抱怨，不过也敢怒不敢言。

我上了 Scott 教的两门统计课。第一门课是去依阿华的第一学期上的，语言都还没太过关，而且好像一整个学期时差都还没倒过来，上课就犯困，所以是仗着自己原来的一点统计学知识和会用 SPSS 的底子，蒙混过关。第二门是博士阶段的必修课，期末考试由当堂闭卷笔试和写论文两部分组成，我拿了两个满分，据说在 Scott 的统计课上是很少见的，令我对统计信心倍增。我后来还选了一门 Scott 教的劳动力市场的专题课，期末论文是模仿他在《美国社会学杂志》上的一篇文章，用他写的一个专门用来做 RC Association Model 的软件做的一个定量分析，倒不是为了投其所好，而是觉得这个模型比较有意思，所以学着做一下，写起论文来比较好玩。他其实并没有讲这个模型，我找资料自己学的，倒也乐在其中。

现在回想起来，在依阿华跟着 Jae 学习和培养起来的这种去不断地学习新的东西的兴趣、勇气和信心对我日后自己从事社会学的研究工作是最宝贵的财富。其实依阿华的社会学系虽然不大，但是在美国社会学专业的声望和排名还算可以，除了还依然在吃历史上的一点老本之外，主要是因为系里的老师都还是挺厉害、挺不错的学者。依阿华社会学的尴尬主要是因为它在美国社会学的学术地位和地理位置。

我在依阿华的那段时间，依阿华的社会学在美国社会学专业中的综合排名基

本上都在 23~24 名;社会心理学是最强的,最好的时候排全美第五名。这几年没怎么太关心了,但估计也不会有太大变化。依阿华城(Iowa City)是一个典型的美国中西部的大学城,出城就是大片的玉米地。城里面离社会学系不远的一个加油站,种的观赏植物竟然也是玉米,我经常在那儿加油,从没觉得有什么特别的,直到有一次车上坐了一位忘了是外面哪个学校来访问的老师,看到加油站旁边种玉米,乐不可支,说:“This is really very Iowa(这可真是非常依阿华).”我才意识到也许其他地方的加油站不都是种玉米作为观赏。

横贯美国的最主要的一条州际高速公路 I-80,东起纽约,西至旧金山,全长 3000 多英里,恰好经过依阿华城,而依阿华城几乎就在正中间。离依阿华最近的大都市是芝加哥,开车约四个小时。2000 年我太太毕业之后在芝加哥工作,我每个周末开车去芝加哥,星期一上午回来,来回路上八个小时,可以听八盘磁带。依阿华城的图书馆里有很多由 Teaching Company 出的 Great Courses 系列磁带,是挑选的全美国各个领域最优秀的一些老师的讲课录音。我在依阿华的那些年,听完了好多门课,有哲学的,历史的,音乐的,法律的等,这些课程在我每周开车往返芝加哥的那一年做出了重要贡献。

但你如果不想每周开八个小时的车和听八个小时的磁带,依阿华确实是个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地方,离哪儿都很远,并且一年五个月的冬天。有一年五月中旬,都放暑假了,跟几个历史系学日本史的朋友和他们的老婆孩子在公园里野炊,阳光明媚,但是冷风飕飕,冻得大家瑟瑟发抖。有个哥们开玩笑说,依阿华这鬼地方,五月份在户外活动,弄不好还会长冻疮。但是其中我最要好的一个朋友,Chris Gerteis,常年短裤、凉鞋,好像也没事,所以也许是因人而异。

这些原因综合起来使得依阿华大学逐渐变成了一个对刚博士毕业的人来说比较有吸引力,但是若干年后,比较成功并且比较有野心的人就又被东西两岸名头更大的学校挖走了的地方。像 Jae 和跟他前后几年到依阿华的那些老师那样,一辈子呆在一个地方的情况在年轻老师中间已经很少有了。Jae 其实也有好几次差点去了其他地方,但是每次都被学校极力挽留下来了,所以到我去依阿华的时候,他的工资是系里老师中间最高的,办公室也是最大的。我想美国学校想留住谁,也无非就是这些办法,因为在美国像在依阿华大学这样的地方当教授,生活本身已经很好了。Jae 对他在依阿华的生活挺满意的,住在城外环境最好的一片居住区,在林中临湖自己建的一栋韩式风格的房子,两个孩子在这种幽静而美好的环境下长大。女儿是依阿华大学交响乐团的首席小提琴手,儿子曾经得过依阿华州少年网球冠军,高中毕业拿到了依阿华大学的校长奖学金,但是他一定要读常青藤联盟的学校,所以去了达特茅斯。

每次依阿华社会学公开招聘,一个职位都是两三百人报名。我有一年是系招聘委员会的成员,第一件事情就是从这两三百个报名者的材料中挑出前三十名。

招聘委员会由五人组成，三名老师，两名研究生。报名者的材料集中放在系办公室里，我们五个人各人自己去办公室里读他们的材料，各自挑出自己认为是前三十名的候选人。然后整个委员会开会，从每个人挑出的前三十名候选人中一起商议出公认的前三十人，提交给全系老师开会讨论。他们讨论决定前十名，然后邀请这前十名的候选人一一到依阿华做讲座，面谈。这十个人基本上就是美国最好的那几个社会学系毕业的最优秀的学生，基本上都有在美国最好的那几本社会学杂志上独立或者跟导师合作发表的文章。他们到依阿华面试，一般每个人都要做一个讲座，系里大部分老师和研究生都会参加，然后会跟系里每一位老师至少单独会面谈半个小时，还要专门去见文学院的院长，所以整个面试至少两整天，挺慎重，也挺费时、费力、费钱的。

十个人全部面试完了之后，全系老师再开会讨论，决定给其中的哪五个人发录用职位的邀请，并且要排出顺序，等第一个人回复说决定不来了，再发给第二个人，直到其中有五个人决定接受来依阿华工作的邀请为止。通过这样的程序录用来的老师，一般都很强，他们到依阿华之后在学术上也都非常活跃和高产。当年系里曾经有个老师跟他的学生一起做过一个分析，发现只算美国各个社会学系在学术上比较活跃的老师在美国最好的那几本社会学杂志上发表的文章数，依阿华的老师的人均发表量是全美最高的。我想这跟依阿华社会学的老师的年龄结构有关，刚博士毕业进来的老师在工作的前六年，面临拿终身教职(tenure)的压力，基本上需要保持每年在最好的杂志上发表一篇文章，否则就危险，所以如果算他们的人均发表量当然是非常高的。

这种年龄结构的好处当然是这个系大部分都是年轻老师，并且都是刚从美国最好的几个大学毕业的非常优秀的年轻学者，所以整个系里充满活力。依阿华社会学系有一个定期举行的理论工作坊(Theory Workshop)，是一个颇为有名的传统，学期中间平均每个月一次，很多著名的社会学家都曾应邀前来展示和讨论他们正在进行的研究。我在依阿华期间来过理论工作坊的美国著名社会学家包括 Bernard Cohen, Sheldon Stryker, Randall Collins, Jonathan Turner, Eric Wright 等等。中山大学的蔡禾教授 1999 年访问美国期间也曾应邀在依阿华的理论工作坊做演讲和讨论他的研究，是理论工作坊当时邀请过的唯一一位中国社会学家。

理论工作坊的形式是每位应邀前来的学者提前提供一篇还在进行中、尚未公开发表的论文，发给系里所有的老师和研究生，还有外系如心理学、政治学系的老师，大家先读。在理论工作坊的时候主讲人其实只做一个简短的介绍，大约 15 分钟，其他时间就都是自由讨论。无论每次理论工作坊的具体内容是什么，系里大多数的老师都会参加，并且鼓励研究生积极参加。社会学系的会议室不大，中间长条形的会议桌边通常是老师的位置，研究生自觉地坐在靠墙的一圈椅子上，如果挤满了也能容纳三四十人。

因为是邀请的各个不同领域的学者来讨论他们正在进行的研究,所以每次理论工作坊的文章内容都因人而异,有关于理论的、方法的,以及各个不同分支社会学领域的。但是在理论工作坊里,各位老师无论自己本人的研究方向和专长是什么,对当时讨论的问题都非常投入,与来访的学者展开激烈的讨论和辩论,但是气氛始终非常轻松、友好和愉快。Jae 几乎每场必到,而且大多数时候都坐在进门桌边的第一个位置,主讲人的正旁边,面对着主持人,大概是为了方便提问,因为坐在这个位置上绝对不会出现你举老半天手主讲人或者主持人没看见的情况。Jae 当然也从来都是问题最多的人,似乎无论讨论的内容是什么,他都可以提出很多命中要害的问题,然后跟主讲人进行来来回回的争论,但是从来都很温和、很幽默、很友好。

我刚去依阿华的时候,Jae 给了我两个建议,一个是去买个带收音机的闹钟,把频率设在依阿华大学的 NPR(国家广播电台)WSUI 上,每天听着 NPR 醒来,并且一天里面只要不是在上課或者干活就把它随时开着,一直到晚上听着它睡着。另外一个就是要去参加每次的理论工作坊。这两个建议我都照做了,两个都受益匪浅(其他还有好多建议没做到,现在想想不知道如果也都做到了会怎么样)。这样养成的每天听 NPR 的习惯到现在我都继续保持着,NPR 给我提供了一个稳定可靠地了解和把握美国社会、政治和文化的窗口。

依阿华社会学系的理论工作坊提供的则是一种重要的,通过耳濡目染起作用的氛围。在这种氛围下,不同学科、专长的学者经常坐在一起讨论、争论各种学术问题。不同的专业、领域的界限只是人为地划分出来的,其实学术的问题,尤其是社会学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相通的。作为一个社会学的学者就应该像 Jae 那样,有着接触和学习新问题、新领域的兴趣、勇气和信心。

情感控制理论就是一个 Jae 和我闯入的一个对我们来说完全新的领域。依阿华社会学主要是四个方向,社会心理学、犯罪学、社会分层、政治社会学。前两个最强,尤其是社会心理学,不仅历史悠久,有个“依阿华学派”,研究方面一直也很强。他们有个装备不错的实验室,是依阿华大学少有的文科实验室,常年让大家帮他们到街头去招募本科生来实验室做实验,成果很多。我刚去依阿华的时候大概像所有中国出来的学生一样,心怀祖国和人民,对微观社会学压根没兴趣,而 Jae 的方向正好也是社会分层和政治社会学,所以前几年我连一门社会心理学的课都没上过。相比之下,我的那些美国同学大部分都是冲着依阿华的社会心理学和犯罪学两个方向来的,因为这两个方向在毕业之后最容易找工作。

1998 年 Dawn Robinson 来到依阿华社会学系,把情感控制理论带到了依阿华。Dawn 是所有学生公认的最容易接近、最和蔼可亲的老师。我第一次约好了去她办公室讨论问题,我们花了大半个小时“八卦”系里的各种事情,然后一看表,一个小时快过去了,干脆一起出去买咖啡,边喝咖啡边聊。有一年她在家举行万

圣诞节晚会，邀请系里所有老师和研究生参加，大家装扮成各种奇形怪状的东西去了。在她前院的草地上立着好多著名社会学家的墓碑，从马克思、韦伯、迪尔凯姆，到当时系里的老师。

Dawn 到依阿华之后不久，理论工作坊就邀请情感控制理论领域比较重要的一个人物，Herm Smith，到依阿华做讲座。Herm Smith 在复旦大学呆过一年，他在这期间在上海收集的中国的 EPA 的测量数据成为情感控制理论的多文化分析的中国数据的基础。Herm 在依阿华讲的就是他对中国数据的分析，引起了 Jae 对情感控制理论，尤其是 EPA 的测量方法的兴趣。

当时 Jae, Dawn 和我都是那时还在依阿华的 Barry Markovsky 组织的一个计算机模拟和社会复杂性研究的讨论小组的成员。我那个时候已经开始对多能动体模型(multi-agent modeling)产生了兴趣，而情感控制理论又有一部分牵涉到计算机模拟(虽然不是基于多能动体模型的模拟)，所以通过这种渠道的互相接触，Jae 已经对情感控制理论有了一些了解。与 Herm Smith 接触之后，他让我把情感控制理论弄明白，然后去跟他讲。

根据 Dawn 提供的线索，我读了情感控制理论最重要的一些文献，然后尝试着去给 Jae 讲，但是因为自己也半懂不懂，没讲得太明白，Jae 不太满意。于是我又去找 Dawn，想全面地了解 and 掌握情感控制理论的理论和方法。

对于我表达出来的对情感控制理论突发的兴趣，Dawn 伸出双手表示欢迎。而所有在我之前就已经跟着 Dawn 在做情感控制理论研究的其他研究生也都像她一样，对我的半道加入表示热烈欢迎，让我一点也没觉得自己是外人，所以我就这么顺利地混入了 ACT-er 的队伍。我想依阿华社会学的这种鼓励不同专业领域的老师和同学之间进行合作和交流的氛围应该是起了一定作用的。

我于是系统地阅读了情感控制理论当时所有的重要文献，对这个理论流派的基本理论和方法论基础以及重要研究成果有了一个比较系统的了解。当我再次去给 Jae 讲的时候就讲得清楚多了，Jae 说：“你这次是弄明白了。”

Jae 主要感兴趣的是情感控制理论用来测量不同文化里的社会交往要素，例如社会身份、社会情境、交往行为等的方法，即“好-坏”(Evaluation)，“强-弱”(Potency)，“快-慢”(Activity)这三个维度。他想把这三个维度用来测量和分析他所感兴趣的西方文化的差异，并且用来测量和分析微观社会交往以外的问题。

EPA 这三个维度来自美国伊利诺伊大学的著名心理学家 Charles Osgood 在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所做的一个多文化的语义研究。基于对 21 个不同文化和语言的分析，Osgood 和他的同事发现在这些不同的文化和语言里，EPA 是人们用来描述各种东西的最基本的三个共同的维度。Heise 的情感控制理论的文化测量部分就是建立在 Osgood 的这个基本发现之上，用 EPA 这三个维度来测量不同文化的人对各种社会身份、社会情境、交往行为等的态度。

我们关于美国、韩国、中国文化的维度分析最初来自 Jae 对 EPA 这三个维度是否适合用来测量不同文化里关于不同社会身份的态度这个问题的谨慎的怀疑。所以他决定第一步的工作是要重复 Osgood 的语义分析,分别在美国、韩国、中国开始收集资料。我们首先在依阿华做了第一次调查,然后 Jae 在韩国进行了第二个调查,我回中国做了第三次调查。我的博士论文就是用这三次调查的数据所做的关于三个文化、三种语言的比较分析。

论文本身是一个比较技术性的基于调查数据的定量分析,所涉及的具体问题也比较窄,这是大多数学位论文的特点。但是因为情感控制理论和相关的理论和方法在中文的文献里还是个比较生疏的领域,所以我在中文版里做了一些适当的扩充和展开,也希望藉此把情感控制理论介绍给更多的中国读者。

本书的最后四章是在原来论文的基础上增加的新的内容,主要是想把近两年来用在调查数据分析上的一些数据挖掘(data mining)的概念和方法用来探索语义空间的距离和特征。但是因为时间有些仓促,所以只是做了一点简单的介绍。

本书最后完成是今年夏天在北卡我的哥哥家。我和 Tony 占据了楼下窗边的一张桌子,面对面地各自做各自的作业,窗外时常光顾的蜂鸟陪伴着我们。感谢我的哥哥慷慨地让我们把他们的大房子当作我们夏天的家。亲情永远是温暖的。

2013 年 8 月
美国北卡

目 录

第一章 导论	(1)
第一节 研究问题	(5)
第二节 研究设计	(6)
第三节 章节概要	(8)
第二章 文献回顾	(9)
第一节 语意差异与 EPA 维度	(11)
第二节 情感控制理论	(15)
第三章 数据与方法	(21)
第一节 数据收集	(23)
第二节 选择社会身份	(23)
第三节 生成形容词和构建两极量度	(25)
第四节 最终调查	(28)
第五节 统计方法	(29)
第四章 中国数据分析	(31)
第一节 描述统计	(33)
第二节 因子分析	(35)
第三节 探索由语意维度所组成的社会空间	(39)
第五章 韩国数据分析	(45)
第一节 数据收集和描述统计	(47)
第二节 因子分析	(52)
第三节 在新维度下探索社会空间	(57)

第六章 美国数据分析	(63)
第一节 数据收集和描述统计	(65)
第二节 因子分析	(70)
第三节 探索三个维度下的社会空间	(73)
第七章 结论与讨论	(77)
第一节 社会空间维度	(79)
第二节 讨论与进一步的研究	(82)
第八章 探索语义空间的距离	(85)
第一节 多维空间的距离	(87)
第二节 社会身份的距离矩阵	(94)
第九章 中国、韩国、美国语义空间里的性别维度	(103)
第十章 中国、韩国、美国语义空间里职业身份的差异	(123)
第十一章 跨语义空间的距离比较	(141)
附录	(151)
参考文献	(169)

DIYIZHANG

第一章

导 论